



读《论语》

赵又春 著

子曰：学而不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知者亦乐乎？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岳麓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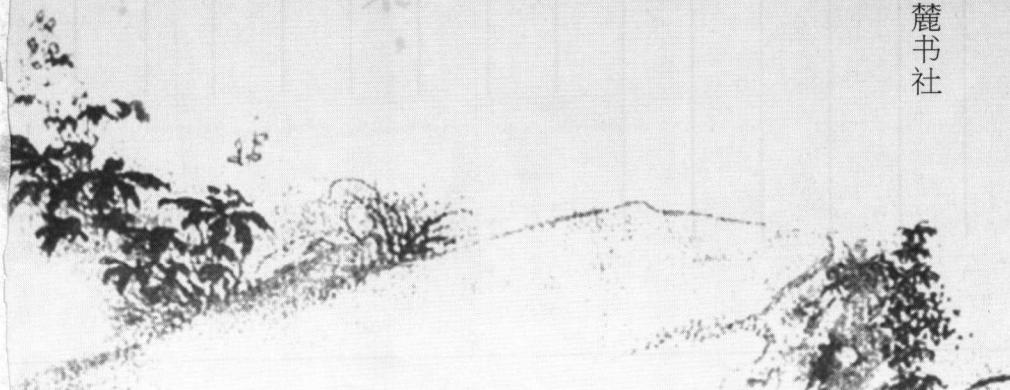
读《论语》

赵又春 著
岳麓书社

子曰：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子曰：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
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读《论语》/赵又春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5

ISBN 7—80665—661—8

I. 我... II. 赵... III 论语—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359 号

我读《论语》

作 者:赵又春

责任编辑:饶毅

封面设计:周畅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14.125

字数:403 千字

印数:1—3,000

ISBN7—80665—661—8/C·467

定价:24.00 元

承印:长沙健峰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张公岭亚大路 93 号(芙蓉工业园)

邮编:410015 电话:0731—46339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序

注释、翻译、解说、谈论、研究《论语》的著作，真是太多了(据有人统计，已有三千余种)，我这无名之辈今天又来添加一种，是出于何种目的？会有人看吗？为了帮助偶然接触到此书的读者决定是否购买一本，或是否继续读下去，我想交代以下几点。下面说的，凡是属于陈述事实的话，我保证句句是真话。

一、本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1. 其他著作都是按《论语》原著的篇章顺序逐章进行注释、翻译和讲解，本书则按内容分类处理。这只要看一下目录就清楚了。这个体例上的特点也许会成为本书的一大优点，对一般读者实现了解《论语》全貌的愿望，可能大有帮助，对尚未把《论语》读熟的专门研究者，则能起“资料作用”。

2. 对于每一章，其他著作多是采取“注释 + 翻译 + 解说”的模式，本书也不这样，而是于原文后写一篇小“随笔”，或者说“札记”，夹述夹议，把对原文文字、语法的诠释，内容、义理的阐述，和对别人理解的批评，融为一体，因此虽未专作注释，却总能以不同方式帮助一般读者扫除文字障碍，直接了解原文，

又读来轻松愉快,特别是,通过对于不同理解的辨析,能让读者不仅因为有所比较而对原文有更为准确深刻的领悟,还会因此得到启发,产生自己独特的理解。不作翻译,是因为我认为,严格说来,古文,特别是《论语》这种语录体著作,是不能够翻译的,就是说,再好不过的翻译也难完全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义蕴和情味,还往往会障碍读者对原文的领悟,限制想象力的发挥;仅仅凭借译文去领会原文,不但可能“原汁原味”尽失,甚至会作出同孔子原意大相径庭的解读。

3. 对以往注释《论语》的著作,本书只涉及到康有为的《论语注》,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四书,而又以后二著为主,全书只对四百五十五章作了解说,竟在一百二十多章中点名道姓地批评了杨、李二先生的翻译,因此,本书可能给人以专门针对杨、李二先生的著作而写的印象。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甚至是最突出的特点。

二、本书的目的仅在对《论语》作出恰切解释,即达到对孔子原意的比较准确的把握。李泽厚说,《论语》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儒学和孔子的《论语》倒有些像西方的基督教的《圣经》一书了。”(见《论语今读》第1-2页)这些论断,大概没有人不同意的吧?但是,对中国人的这部《圣经》,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却存在着颇多颇大的差异,据说《论语》的每一章都有不同的诠释。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孔子被尊为圣人之后,一般人对他的言论就只能一味地拔高,尽力往高深处解,不敢有半句“微词”,有人还采用所谓“六经注我”的方式,借孔子之口布他自己的道,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惜曲意作解。因此,对《论语》一直有个“它在孔子本人那里究竟是什么意思”的问题。是的,对同一本书,甚至一句话,不同读者有不同的理解是很正常的,谁也别想作出保证公允的解读,更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人。但这个情况当然不能太夸张了,以致认为人们对任何一本著作都不可能基本一致的理解。如果真是这样,人类怎

么能够交流思想,大家又何必发表著作呢?就《论语》而言,我同意李泽厚的观点:“幸亏《论语》还不是诗篇,有时还可趋向‘达诂’(准确解释)。”基于这个想法,我很希望自己能在使《论语》趋向“达诂”方面作点贡献。我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来写作此书的,并且只把目的和任务局限于这一点,不涉及孔子和《论语》研究中的任何其他问题。《论语》的分章和标点,各种版本不尽一致,本书也不予涉及,惟杨伯峻《论语译注》一书是从。不过我也坚持认为,对于《论语》本文做到“达诂”,并且让它成为人们的共识,是孔子和《论语》研究工作的基础,离开这一点,任何所谓研究成果都只能是“私人的”,不能成为“社会财富”。

要求得“达诂”,除仔细认真研读本文和尽可能多地掌握背景资料外,不能不对已有各种不同解读作批评性分析。因此,本书对《论语》各章的解说,大多是混合着我自己的理解和对流行注译的批评的,并且常是在批评中阐述我自己的看法。对已有的《论语》注译著作,我只选择了康、钱、杨、李四人的,一是我预定本书的对象为一般读者,而非《论语》专门研究者,我估计他们不会去读康有为以前的人写的书,而那些书中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又多在这四位的书中有介绍;二是因为后三位先生的书中都有现代白话文翻译,一般读者恐怕主要是凭借译文而不是仅靠注释去理解原文的。至于重点又放在杨、李二位的书上,则是因为我认定杨先生的《论语译注》和李先生的《论语今读》,在今天的读书界,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因此,我要特别说明:本书确实主要是针对杨、李二位先生的著作而写的,但我除了抱着上述目的外,绝无任何别的意思。在古文功底和学术水平方面,我“自信”远不如他们二位,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我并不因此取消我批评二位的译文的资格——我对李先生的批评,全是针对他的翻译,几乎没有涉及他在“记”中发表的其他议论——也希望读者是在至少读了本书若干页之后再对我的批评进行批评。我还要感谢二位先生,正是他们的著作引发了我写作此书的动机,对有些章句,我还是因为受了他们著作的启发,才形成了自己的有时难免自鸣得意的理解。

三、我认为对《论语》的章句做到“达诂”的条件是以下三点：

1. 对原文字句和语法的训释说得过去。《论语》有些章句所以发生歧解，是因为读者对其中的词语作了不同的解释，或对句子作了不同的语法分析，因此有了选择哪一个义项或分析才符合孔子原意的问题。例如《八佾》篇第4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其中“易”字很难解，我所见到的所有训释都显得勉强。如果根据“与其……宁……”这句式想到，“易”是同“戚”相对待的，再证以前句也是把“奢”和“俭”对立起来，于是认定“易”在这里是表示情感的词，应译为“轻松愉快”，这样对全句的理解就显得很圆满，远胜过以前的各种说法了。问题是，“易”字在孔子时代是否有这个含义呢？当然只有找到了确有这含义的证据，这理解才可以接受。但也同样当然，只要找到了证据，就应该至少暂时把这个理解当作“达诂”，从而抛弃先前的各种说法。又例如，《季氏》篇第19章最后一句：“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都把这里的“民”字解释为“人民”或“老百姓”，但这样却使句子在语法上完全说不通，前后意思也不贯气了；要说得通，使之贯气，必须认定“民”字前脱漏了一个“之”字，“困而不学”是“民”的修饰成分，或在“民”后加个逗号，让二者是同位关系，但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脱落”，更没有理由认为，在孔子心中，人民和“困而不学的人”在外延上是全同关系。因此，这个理解不配称为“达诂”。

2. 要能使全章意思具有逻辑性。有些解说，对某一章原文所有词语或句子的解释，孤立地看都能够成立，但联系起来，全章的意思就逻辑上显得不严密了，或自相矛盾，或论事的“视角”本应一致却不一致，或前后意思应该具有“对称性”的变得不对称了，等等。这自然应该认为未能达到准确理解，必须“让位”给足以消除这种逻辑缺陷的解说。例如对《雍也》篇第29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有人解说前一句时，说中庸之德是“至广、至大、至平、至易、至可宝贵”的，是“天下定理”，“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却又将后一句翻译为“但一般民众，少有此德也久了”，或“人们很久没有拥有了”。这不是在说“人们永远有的东西但很久没有了”吗？岂不自相矛盾？因此，这就不能视为

“达诂”。又如 17-6 章中有一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头一分句单独看，其中的“不侮”可以说是“不侮辱人”，也可以说是“不受人侮辱”。有人就按前一说理解，但从全句看，这理解就欠周全了，因为后几句都是从你对别人怎样别人就会对你怎样这个角度说的，孔子怎么会突然换了角度呢？所以我以为应从第二说。所以我认为，没有逻辑毛病应是“达诂”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我还要说一点意思，那就是有人认为《论语》中多有不合逻辑、自相矛盾之处，我则以为，就每一章而言，在孔子思想中是不会有逻辑矛盾的，倒是解说者的解说常常自相矛盾，因此，如果某一章从文字上看确有矛盾，也只能承认那可以消除逻辑毛病的解说可能成为“达诂”。

3. 不和《论语》其他章句的说法相抵触，即能让孔子和《论语》的思想在总体上达到自洽。《论语》中的有些章句，可能确实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即都符合以上两个条件，但如果参照孔子在其他地方的相关说法，则只有一种理解能够与之一致。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必须做“协调工作”，就是说，或者只承认能够与他处说法相一致的那个理解是“达诂”，或者改变对他处的那些有关说法的既有解说，使与这里的多种理解都能一致。例如，《论语》中有两处说到“无友不如己者”，这似乎很明白，但仔细一想，这“不如己”是从总体上说的，还是就某一方面而言，或者只是孔子针对特定的人的教诲？都有可能。那么该选哪一个呢？这就必须参照其他说法来确定了。又如，孔子是否真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他对人的“求名欲”究竟抱怎样的态度？可以作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回答，又都可以从《论语》中找到证据。那么，是孔子不自觉地作了自相矛盾的表述，还是因为在这问题上尚未有固定的看法，因而不同时间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抑或他思想上其实是有明确一致的认识的，只是由于说话的背景不同，所以提法上有所区别？这就要求我们作全面的分析了。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只有那能够使孔子思想作为一个体系达到最大程度自洽的解说，才可以暂时承认为“达诂”。这是很难完全做到的，但又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因为《论语》这种语录体著作中，难免多次遇到这种章句，而要对全书做到“达诂”，认为属于这类章

句的则决不可以太多。

我认为学界应该承认,《论语》的有些章句,在今天简直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章的公允的“达诂”,只好等到有更多涉及《论语》一书的文物出土以后去发现了。因此,本书把我认为属于这一类的十三章,再加上字面意思虽不会有歧解,但其义理却很难阐释的十七章,一起作为难解章来处理。对这三十章,我作不出解说,只点出难在何处。

最后,我想说:

1. 本书行文可能给人,特别是专家学者们以不够精练甚至啰嗦的印象。对此我要说,这是因为我希望一般读者阅读了本书后,不仅对《论语》原文有准确的了解,还初步具有识别不同解说之正误优劣的能力,因此我作解说就不能“点到即止”,必须说明白点,透彻点,这样,文章就显得论证过细,有些烦琐了。但因此我要颇自信地对读者说:你们读了别的《论语》注释读物后,也许会觉得并未帮助你读懂《论语》原文,但认真读完本书后,一定不是这种感觉。对于只想了解本书到底有哪些新意的读者,我则建议先读第五和第四部分,因为本书的新意,是越到后面越多的。

2. 如果读者问:你这本书中对《论语》各章的解说都是“达诂”吗?我的回答将是:可能有几章以后也将被认为是一种误解,有一些则大概会被当作“一说”,还得不到“达诂”的评价;但至少有不少,甚或许多,以至绝大部分,特别是我对之作了解释的那些章句(有六十多章,加上句和词,至少有一百多),是比较全面地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的,因而可能被学界暂时作为“达诂”来接受。我诚恳地欢迎并殷切地期待读者对于本书的任何批评意见。

赵又春

2005年2月25日于长沙岳麓山下

目 录

序	(1)
一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1)
(一) 学生的赞誉和同时代人的评价	(1)
(二) 孔子自况	(11)
1. 道德修养方面	(13)
2. 学问才能方面	(16)
3. 理想信念方面	(24)
4. 实际表现方面	(30)
(三) 孔子学生心中的孔子	(37)
1. 人品和主张	(37)
2. 教学情况	(43)
3. 其他方面	(46)
(四) 孔子评人	(54)
(五) 附:《论语》乡党篇	(73)
二 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	(76)
(一) 何谓君子	(78)
(二) 君子的品德和才能	(84)
1. 品德	(84)
2. 才能	(94)

3. 君子的五个“三”和一个“九”	(97)
(三) 君子和小人的对比	(103)
三 孔子论“为政”	(122)
(一) 要“为政以德”,推行德治	(122)
(二) 德治就是对老百姓好一点	(129)
(三) 德治的目标是“天下有道”	(138)
1. “天下有道”的标准	(138)
2. 为官之道——身正	(142)
(四) 施政方法:正名分、举贤才、求实效	(149)
1. 正名分	(149)
2. 举贤才	(155)
3. 求实效	(161)
四 孔子的教诲	(170)
(一) 如何尽孝	(170)
1. 孝的根本要求是“无违”	(171)
2. 尽孝不仅在“养”,更在于“敬”	(180)
(二) 如何待人	(186)
1. 一般原则:忠、信、义	(186)
2. 怎样交朋友	(200)
3. 怎样事君	(209)
(三) 如何行事	(213)
1. 一般原则	(214)
2. 怎样对待名望	(226)
(四) 关于思想方法	(232)
(五) 关于学习和教育	(246)
1. 学习	(246)
(1)学习的重要性和目的	(246)
(2)怎样学	(258)
2. 教育	(266)

(六) 如何对待天、命和鬼神·····	(286)
1. 天·····	(287)
2. 命·····	(293)
3. 鬼神·····	(298)
五 孔子的仁学理论·····	(303)
(一) 礼·····	(304)
1. 礼的本质和作用·····	(305)
2. 礼是变化发展的·····	(320)
(二) 道·····	(326)
(三) 德·····	(337)
(四) 仁·····	(367)
1. “仁”即仁心——爱人之心·····	(370)
2. “仁”是仁者——有最高道德的人·····	(379)
3. “仁”乃仁境——人的道德境界·····	(389)
4. “仁”指仁政——以仁心施政·····	(400)
六 《论语》难解章·····	(415)
附录一 《论语》人物简介·····	(429)
附录二 《论语》原著各章在本书中的页次·····	(433)
后记·····	(438)

一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论语》有五分之一篇幅，包括孔子的自我表白在内，是描述孔子其人的，第十篇《乡党》全部是记载孔子在家乡生活期间的饮食、起居、衣着和待人接物的具体表现。这些章有助于认识孔子的人品、性格，对于了解他的思想学说，则多只有参考意义，特别是《乡党》篇。因此，我把分散在各篇之中的这些章集中起来，稍作分类——“稍”，是说这个分类的标准不很严格——并将《乡党》全篇作为附录而置于这部分之后，但不作解说。希望这样做能够帮助读者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孔子的形象。

（一） 学生的赞誉和同时代人的评价

9-11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颜回是孔子最欣赏、最器重的学生，这段话既反

映了他对孔子的极度崇敬，又表现了他学习的不遗余力，只是说得近乎神秘了。仰望孔子的形象，或者说形象化了的孔子之道，觉得越看越高；去钻研研究，又感到越钻越深，难得吃透，这很好懂。可为什么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后了呢？这就不好理解。莫非孔子的人品和思想是不可捉摸的？还未见到哪个注家对此作过说得通的解释。我来冒险试一下：这两句是针对后面“约我以礼”一句说的，本应放在这一句之后，为了行文的需要，提到前头了。因此，这两句作为整体的意思是：按夫子的中庸思想，用礼来约束、规范行为，用道来指导实践时，必须掌握好度，“过”，也即“在前”，和“不及”，也即“在后”，都是不行的，可我正是容易犯这两种毛病，常“忽焉”在前，“忽焉”在后，总达不到适度，以致“欲罢不能”（因为只有适度了，恰到好处了，才能理得心安，暂时作罢）。所以后面接着说的是更进一层的意思：即使竭尽全力掌握了度，似乎很好地立（“不知礼，无以立也”的“立”，见 20-3 或 16-13）了起来，要想继续追随前进，也不能凭靠老路径，将又会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作为《论语》的读者，从这一章感到的，大概不仅是孔子师德的崇高和学问的艰深，以及颖川学习的刻苦和尊师的至诚，还有“师生关系怎么竟达到了这一步”的惊异和感叹吧？

19-24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这段话好懂。“无以为也”，可译作“不要这样说啊”，这个“以”是副词，相当于“如此”、“这么”。子贡把孔子和一般贤者的差别比做丘陵同日月的差别，所以前者可以超越，孔子是不可企及的。“虽”在这里是“即使”的意思；“自绝”后省去了“于日月”三字，因为诽谤别人意味着同人断绝关系，所以子贡用自绝于日月并无伤于日月来比喻地说明，你诽谤孔子并无伤于孔子。“多见”等于“仅见”，“不知量”是说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子贡说这话颇带点愤慨，洋溢着对孔子的忠诚和爱戴。这章

同时说明，孔子并未被他的同代人公认为圣人。

19-25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贡以会说话著称，又很有才干，工作后也业绩显赫，所以有人认为，他总说自己比不上孔子，不过是谦恭而已。当陈子禽向他表达这意思时，他果然又显示了口才：先指出君子一句话就会暴露自己智或不智，委婉地批评对方言之不慎；接下说，要赶上孔子，如同架梯子升天一样不可能；最后来个假言命题：要是让孔子作诸侯或卿大夫之类的官，那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立就立，一道就行，一绥就来，一动就和；于是结论当然是，孔子生荣死哀，谁也超不过（“……者，……”这个句式可以表达条件复句，“者”字前是条件）。“立之”、“道之”、“绥之”、“动之”中的四个“之”字都指代“人民”；“立”是“立于礼”的“立”，“道”是“道之以德”的“道”，“来”是“远者来”的“来”，“和”是“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这些词用今天的白话文翻译出来，不但会使原文的神韵尽失，即使纯逻辑意义也常难准确传达。“行”、“绥”、“动”分别是“前进”、“安抚”、“动员”的意思。

还没有可靠的根据肯定或否定这个陈子禽也是孔子的学生，只是有注家说是的。如果真是，那么孔子的学生中，后来也有人认为孔子是可以超越的。

19-23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贡。
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这一次叔孙武叔不是诽谤孔子，而是在朝廷上当着众官员表彰或

推荐子贡,所以子贡语气缓和得多,还隐晦地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叔孙武叔抱有这种看法(我子贡胜过孔子)确有客观原因,并非有意贬低孔子。用来说明这客观原因的譬喻,实在是太妙了,既褒扬了孔子,又表现了自己的谦虚,还曲折地暗示了,我子贡确实不错,以致人们误以为孔子都不如我。这样一个会说话的人,我们对于他颂扬别人的话,是否也要多个心眼呢?

本章中的“宫”,是泛指房屋、住宅,非特指王宫、宫殿,故“宫墙”就是宅院的围墙。古时宗庙与住房相连,房舍,特别是议事之所,也可称百宫,所以它们都在围墙之内;一切约七八尺。“室家之好”当是指屋里的各种好东西;“不得其门而入”是“如果没有走进门去的话”的意思;“或”在这里相当于“也许”。后一个“夫子”乃指叔孙武叔,不是指孔子,所以最后两句的意思是:武叔他老人家那样说不也很自然吗?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孔子热心于政治,离开鲁国到卫、陈、蔡等国来,就是为了寻找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必定与闻该国政事。是他设法求得的即打听到的,还是别人向他咨询时主动告诉他的?子禽不知内情,故有此问。子贡不直接回答是求得的,因为说出来有损孔子尊严,又不好撒谎,于是所答非所问地说是凭孔子的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五种美德得来的。最后一句更有意思:就算是求得的,孔老夫子的这种求也同别人的求不一样吧?显然是想给对方一个印象:既然这样,那就不能说是求得的。但我们作为《论语》的读者,产生的印象却是:不但是求得的,而且还可能采用了不便张扬的手段,例如攀交该国上层人士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本章中的“其诸”是发语辞,表示不肯定的语气。

3-24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

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第一、二两个“见”指“(被)接见”，第三个“见”是“引见”。“二三子”是对孔子的从者即学生们的称呼。“丧”是动词，特指失去官位。“木铎”，具体形状质料等不必追问，反正是一个大铃，国家有政令大事需要宣布时，就振响它，以召集人们来听取。这章的意思很明白了：仪封人得到孔子接见，听了孔子一席话后，了解了情况，很是同情和佩服孔子，所以出来后就安慰孔子的学生们：不要以你们老师暂时丢官为意，要相信，这是老天的有意安排，让你们的老师出来传道，教育人民，以改变天下长时间无道的局面。将孔子比喻为木铎，显然是说，他将成为大道的发布者、传播者，也即大众的老师。这个仪封人大概是个地方小官，“君子”在这里应是指较大的官员，或泛指德高望重的人。

3-15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鄫人之子知礼乎？
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鲁国的太庙即周公庙，里面一定陈设许多礼器，在这里举行的祭祀仪式，繁琐、庄严、隆重，所以是学习礼仪和印证、检验平日所学的好地方。这地方也不是随便可以来的，所以孔子得机会来一次，就“每事问”。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普通年轻人这样表现，一定会被表扬为好学。从“鄫人之子”这个称呼（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在鄫邑作过大夫，按古习，可以这样称呼他的年岁不大的儿子）看，孔子当时正年轻，可他却因“每事问”而受到讥讽，这显然只能这样解释：年轻的孔子在“知礼”方面已很有名气，“或”人觉得“每事问”与其名气不相称，故也。本章最有意思的是孔子听到这个讥讽后的表现：既不生气，也不解释，而是说：“这正是礼。”多么有涵养，有抱负，有气魄！《论语》的编者这样描写他们的老师，真可谓大手笔。

14-38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石门在哪里？为什么子路在城外过夜，凌晨即赶忙回城，致遭守城